

毛泽东自传

简体字配图本·彩色影印原本

青 岛 出 版 社

毛泽东

毛泽东自传

◎ [美] 埃德加·斯诺笔录 ◎ 汪衡译 ◎ 王粹校注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自传/(美)斯诺笔录;汪衡.~青岛;青
岛出版社, 2003.11
ISBN 7-5436-3000-1
I.毛… II.①斯…②注… III.毛泽东(1893~
1976) -自传 IV.A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 0982229号

书 名 毛泽东自传
笔 录 埃德加·斯诺[美]
翻 译 汪 衡
校 注 王 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传真:(0532)5814750
责任编辑 刘 咏(E-mail:lyg_qd@sohu.com)
高继民
装帧设计 若 谷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广
出版日期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640 x 960mm)
印 张 13
字 数 150千
书 号 ISBN7-5436-3000-1
定 价 28.00元
盗版举报电话:(0532)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倒装、错装、字迹模糊、
缺页、散页等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厂址: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276017 电话:0539-2925659)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出版说明

《毛泽东自传》是一部大众喜爱的领袖传记。在它面世的60多年里，其各种中英文的版本出版了不下20种。现在，仅我们能够找到的，或知道具体出版发行单位的，就有17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它的发行量已在200万册以上，可谓一部经过了时间考验、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其中的许多动人故事、传奇经历和闪光的哲思及对于旧制度的批判，都分外引人注目。上了年纪的人读了，会有种重温旧事、展翻老照片的感觉。而对于青年人，这是一部探寻领袖心灵轨迹，发现社会进步、时代变迁规律的最好的教科书。

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曾经生活在“红星照耀”的时代，因为我们曾经与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同处在一块亚洲大陆上，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位伟人。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曾经影响过历史的进程。他的这些故事，尽管都是些昨天的故事，但今天我们读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历史是青铜色的，年岁越深，越能闪烁出奇异的光芒。

这部《毛泽东自传》，是在今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前不久发现的。它的原本是1947年7月胶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一种单行本，后来又于1949年“七一”党的生日期间在《胶东日报》上部分连载过。因青岛地区一直是胶东地区的重镇和革命中心，故我们还可以将这种“胶东版”称为“青岛版”。其最实



出的特点是，它与1937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版本相比较，译稿更完美，并且改正了许多错译和不妥之处。

《毛泽东自传》本是1936年10月由毛泽东口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吴黎平现场口译的一部毛泽东英文自传。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自传的多种版本中以著名翻译家汪衡的译本影响最大。这次“青岛版”的重新编注和校订，主要是以1947年7月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汪衡译本为底本，并参照了吴黎平先生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斯诺的《西行漫记》、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和其他一些版本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印象》、《中共党史大事记》等书籍。

为了使读者更有亲切感，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还大段地引用了吴黎平先生的许多译文和说明，以仿宋字体插入相对应的原文中，补足了《毛泽东自传》其他版本的一些背景资料的不足。斯诺对于采访现场的一些情景描述，也用“斯诺引言”的形式，以仿宋字体分段插入原文加以补充说明。同时，凡是编校者引用或校订过的一些文字，将在书中以“（）”的形式出现，如“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对于汪衡译文中许多明显的错译、误译、漏字、衍字和旧时的不规范文字，以及排版中的一些错字、别字，也做了较为详尽的校正和修改，如“的”改为“地”或“得”、“他”改为“它”、“作”改为“做”、“铜版”改为“铜板”、“化钱”改为“花钱”、“激烈”改为“激进”、“坏疑”改为“怀疑”、“友宜”改为“友谊”、“叫着”改为“叫做”、“铁器”改为“铁路”等等。对于原文的一些标点符号，我们本着在尽量保持原文风貌的基础上，也参照其他版本进行了校订。

由于时过境迁，许多青年人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掌故缺乏了解，故这次编校时，我们还采用了大量的注释，给读者以互相观照和对比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正文当中，年号不对的，记载不清晰的，注释当中都做了相应的改正。我们对汪

衡的原文译稿一般不做改动，保持其原汁原味和文献价值。

与《毛泽东自传》的其他版本不同的是，我们在编校过程中还选配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使本书图文并茂、形神兼备，更具可读性。为了使读者便于对照、查阅原版，我们还将1947年7月的原版影印出来附于书后，以供读者参考。另外，因《毛泽东自传》有不少版本，所以本书还以“附录”的形式，增补了《〈毛泽东自传〉的问世与版本之研究》一文。《斯诺第一次与毛泽东相见》和《斯诺传略》等文章，自然是许多读者非常关心和珍视的，我们也一并收入本书的附录中。

自《毛泽东自传》“青岛版”的发现到出版，编校时间很短。期间，我们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历史文献资料，为这部《毛泽东自传》（青岛版）的出版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资料和编校者水平所限，其中的错误在所难免，在此祈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英文版原书《代序》

斯诺

这儿是一个声明。

《毛泽东自传》用的是第一人称，跟这儿发表的完全一样。可是毛氏原先是要求我改用第三人称发表的。如果这样一改，就会失掉了许多正确性和趣味性的价值。

美国一家杂志愿意分期揭载这部自传，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以自传的形式，而不是要用传记的形式发表。其时，我无法晤见毛氏，也就没法得到他的许可。然而这稿子，如果为了毛氏个人这一点谦逊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觉得牺牲性太大，所以就由我个人负责，保持了原来自传的形式。后来此稿在《亚细亚》杂志上分期连载，曾引起了各方面广泛的注意与讨论。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英文版原书《代序》	[003]
《毛泽东自传》(青岛版)简体字本	[001]
第一章 一颗红星的幼年	[003]
第二章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027]
第三章 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061]
第四章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091]
附 录	[117]
斯诺传略	[118]
斯诺第一次与毛泽东相见	[123]
《毛泽东自传》的问世与版本之研究	[137]
后 记	[155]
《毛泽东自传》(青岛版)彩色影印本	[159]



中國共產黨元年表



(甲)
毛澤東自傳

版出店書華新東路

高



毛澤東自傳

湯學年題

史諾錄

汪衡譯

舊經西書明華

書叢小讀文

毛泽东自传



一颗红星的幼年



[斯诺引言]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为自己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犹如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无礼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②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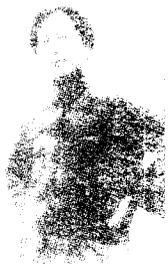
②赏格，即当时国民党在抓捕毛泽东等一些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时，向社会公开“悬赏的价格”如，毛泽东是“二十五万元”

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了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问题的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的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大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



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大声说道。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吴黎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ch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作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

下面就是原文。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③。我的父亲^④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

●毛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冲”为我国南方方言，意为山区的平地。

●毛泽东的父亲，名叫毛貽昌，字顺生，号良弼。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一年多的兵。据《西行漫记》载，他的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母亲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母亲的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相距10余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七妹18岁时和毛貽昌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有四人夭折，只余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兄弟三人。毛泽东的祖父叫毛恩普，是个敦厚的庄稼人，曾因家境窘迫，将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毛貽昌是毛恩普惟一的儿子。在毛恩普去世的时候，毛泽东才1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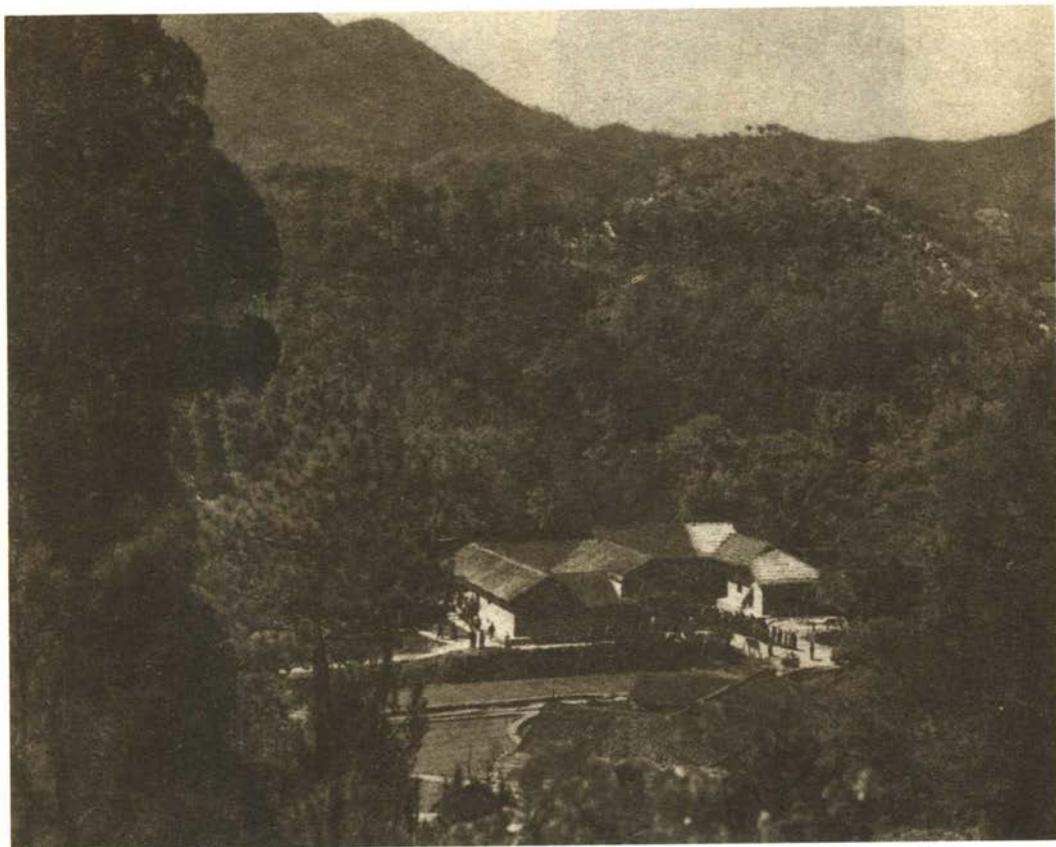
毛泽东的父亲毛貽昌和母亲文七妹



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买回了他的土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升到“富”农的地位^⑤。这时，我

^⑤据吴黎平注释：这里毛泽东同志说他父亲是富农，韶山的同志说解放后他们对毛泽东同志家的成分定为中农。我想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问题是时间相隔四五十年，毛泽东同志家庭的经济情况变了。按毛泽东同志对斯诺所谈情况，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富农成分，我清楚记得他说的是“富农”，我译为“Rich Peasant”。谈了之后，斯诺照此写成文字，黄华同志译成中文给毛泽东同志审查时，他也未改动。韶山的同志把毛泽东同志家里的成分定为中农，当然是根据临解放时的情况。吴黎平这番话是在1979年写的，那时的出身成分对于每个人都至关重要，故吴先生作了这样的说明。



毛泽东故居——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这里。

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每年仍有四十五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⑥。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做耕田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只）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吃饱的。

我八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⑦。我的塾师^⑧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

●毛贻昌除赎回父亲毛恩普典当的土地，还购买了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他善于经营，后来做稻谷和猪牛生意发财，还自制过一种叫做“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流行乡里。

●“四书”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现在，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内，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论语》和《诗经》。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有个舅舅，那时正在开馆教读，故毛泽东有时也去听他讲书。8岁时，父母便把他接回韶山，入了私塾。至16岁前，他曾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风趣地把这段童年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这里说的“塾师”，是指教书先生，当是井湾里的一段往事。

十三岁的时候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山谷里面。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比以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罢工（罢课）”。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的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里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文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砺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工人们吃鸡蛋和白米饭，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的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里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由）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工人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



毛泽东的外婆家——与韶山冲一山之隔的唐家坳。毛泽东的童年时光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



1919年10月，毛泽东同父亲(左二)、伯父(左三)和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感情作用的显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不合乎中国的道理^⑨。

但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父亲辩论。我引据经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喜责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⑩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青年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更多地做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明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斯诺]。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



● 毛泽东对于父亲的许多所作所为不赞同，所以成了家里的“反对党”。1904年，当他的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时，毛泽东和母亲都不赞成，认为应该设法帮助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而不应当趁机买他的田产。而父亲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他和母亲的劝说当然无效，这件事给童年的毛泽东留下了创伤。

● “为上”是对于长辈或位尊者的一种尊称，意思是“在上”的人。这里是指长辈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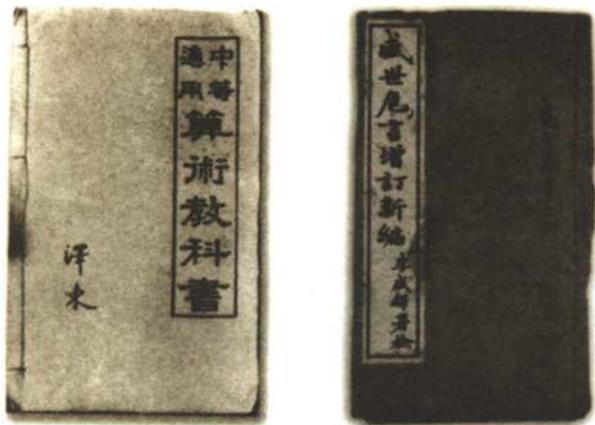
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咒骂他，我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旁边，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向前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膝一下。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①。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打骂得更厉害。

发现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死硬派”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有许多的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传奇小说），尤其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酷戒^②，读了《岳飞传》、《水

● 1906年12月23日，这天正好是冬至。父亲为了让毛泽东学生意，在宴请朋友时，曾让十三岁的他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本不愿意做这些事，由此惹恼了父亲，故受到责骂，引出了一场“跳水风波”。毛泽东曾当着客人的面反驳父亲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这些话，表现了少年毛泽东的一种愤世嫉俗的个性。

● “酷戒”即是“严酷劝戒”的缩写。旧中国当时的私塾里是不容许孩子看一些与经书无关的课外书籍，所以塾师对毛泽东的做法进行了“酷戒”。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书。《盛世危言》曾激发了毛泽东的爱国思想。



浒传》、《反唐》^①、《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是害人的。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过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喜欢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时）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

^① 这里说的《反唐》一书，编者认为应是《说唐》，也称《说唐全传》。另一说，指《隋唐演义》。

諫昌先生存十一本內感世危言失布
匣新民叢報撥去首葉抱歎之
至志尚希原諒
又國史科二本 信一封
澤東敬白 廿月廿一日

书以外。这使要我读经书的父亲十分生气，尤其是当他因对方^⑭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门遮盖起来，所以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⑮。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改革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⑯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想将之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读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助他打赢官司的，如同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旧罗曼小说（传奇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和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以后，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在宗教上是一个怀疑



●指与毛貽昌打官司的人家。

●《盛世危言》的作者是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他做过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等企业的总办或会办，主张改变专制，设立议院，倡导西学，实行护商等政策。《盛世危言》是一本主张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著作，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辛亥革命后，他寓居上海，另有《易言》、《郑观应集》行世。

●“积弱”即“长年积蓄软弱”的意思。那时老夫子们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也就是在寻找清政府腐败、软弱、落后的种种因素。

主义者，但母亲则笃信神佛，她给予她的孩子们以宗教教育。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板起面孔讨论我的父亲对母亲的欠缺礼貌的问题了。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他向我们进攻得太厉害了。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我的读书渐渐地影响我，我自己愈来愈怀疑，我的母亲注意到我这一点，因为我对于信仰鬼神的漠不关心而责备我，但我的父亲则不说什么。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及提防而马上惊逃，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回想老虎神秘逃去，感觉很奇怪，他开始想他是不是没有开罪菩萨。自那时候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然烧香，但是当我在另一个意义上堕落的程度增高时，这位老人并不管它，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盛世危言》继续引（发）我求学的欲望，我开始厌倦我在田里的工作。这自然是我父亲所反对的，我们发生争执，最后我脱离家庭。我到一个人失业的法律（法科）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在一位老学究面前攻读，又读了许多时事文章和其他的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了）一个影响我的整个人生的事件。在我们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学生看见从长



沙回来的许多豆商，我们问他们何以离开长沙，他们说城中发生了一个大叛变，并告诉我们这回事^①。

那年有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他们都很发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了一次示威运动。他们进攻满清衙门，砍下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驱走巡抚。以后那市政司（布政使）骑着马出来告诉老百姓，政府要设法救济他们。他说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喜欢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他被撤职。一个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通缉叛党的领袖，他们许多人被砍头。他们的头（被）悬挂在柱子上，以警告来日的“叛徒”^②。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社会问题，终于在他面前重现了。1910年4月，遇上灾荒年，粮价飞涨，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饥民暴动。有些饥民向巡抚衙门请愿，遭到枪击，有14人当场被打死。于是饥民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等。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20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消息传到韶山，少年毛泽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据吴黎平注释：这里说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群众攻打巡抚衙门时，湖南巡抚岑春……被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廉良。庄在未上台时表示同情群众，所以曾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他在当上了代理巡抚后立即翻过脸来，严厉地镇压群众。群众风潮继续发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庄二人都撤职，另调官员担任湖南巡抚。



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造反的家伙”，但只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他们不认识这对于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刺激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于是我深恨这样对待他们也是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①的会员和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上控告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容易促成一个于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员失败了，但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②上去，在那里他们建筑了他们的要塞，官兵被派去打他们。那地主放出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叛徒”的领袖叫“磨刀石彭”^③，“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对造反表示同情。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经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缺少粮食，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一个“吃

● 哥老会原本是清初由闽粤客家移民在四川建立的民间组织，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四川方言呼弟为“老”，故哥老会又叫“哥弟会”，是天地会的支派。首领称“老大哥”或“大爷”，互称“袍哥”。参加该会的人多为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社会闲散人员。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会众相继参加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参加武装起义。后来，该会往往为反动势力所操纵和利用。

● 据吴黎平记载，此山名叫“浏山”。

● “磨刀石彭”，是一个名叫“彭铁匠”的工匠。



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到长沙治病时同毛泽东及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合影。

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一村运到城中去，虽然本村粮食缺少。他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怒发冲冠，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想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对于我另有一个影响，即某一个小学校有一个“激烈”（激进）的教员，他所以激进，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我钦慕他，并与他的意见相同。

这些事件相连地发生，给予我的已经反叛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认识，尤其是我读了一个谈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②，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③。当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担心，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 这里主要是指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上的一些内容。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还有，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等。

● “安南”即是越南。当时，清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保护责任。1883年，法国全面侵略越南，迫使越南签订了越法《顺化条约》，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6月，中法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从此，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缅甸同越南一样，在清代也曾臣服中国。1824年，英国发动侵缅战争，清政府曾多次交涉。英推说不知中国对缅甸的宗主权。1885年12月，英兵攻占缅甸首府曼德勒，缅甸并入英属印度。1886年7月，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



我的父亲要想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钱店做学徒。最初我不反对，以为这也许很有趣的，但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的父亲反对，便考进那个学校。这学校是在我外公的县城里，我的一个老表^②是“激烈”（激进）的一个学生，他告诉了我这个新“近代”学校的情形。那里经书是不大被注意，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很多，教育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与我的老表进那个学校，注了册，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的学生，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十四吊铜板，以做我五个月的膳宿费以及我读书需要的物件之用。我的父亲因他的朋友劝他说：这个“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的赚钱本领，最后让我入学。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我是十六岁了。

在这个新学校，我能够读自然科学和新西学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的一位是日本留学生，他戴上一个假辫子，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称他是“假洋鬼子”。

我以前没有看见过那么许多的儿童在一起，他们大



●《西行漫记》和“上海版”均将此处记为“表兄”。毛泽东所说的表兄名叫文昌，他告诉毛泽东的新学校，即离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1910年秋天，毛泽东走出韶山求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多是地主的儿子，穿着奢侈的衣服，很少农民能够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的一个学校。我穿得比别的学生都整脚。我只有一套清洁的袄裤。长袍学生不穿，只是教员穿。除了“洋鬼子们”以外，没有人穿西装。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平常我穿破烂的袄裤。但在他们中我有两个朋友，而且是我的好同志。这二人中之一，现在是个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欢），做一个湘乡人是很重要的。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常常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是要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哪一区的人，结果三（个）地方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得不舒服。

我在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欢喜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志不在经书，我读我的老表给我的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②，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

● 由梁启超创办并主编的《新民丛报》（半月刊），创刊于1902年2月8日，1907年11月20日停刊。该报提倡维新思想、公民道德和教育等，在当时影响很大。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昌曾将《新民丛报》借给他。毛泽东在阅读时，还在上面加过一些批注。如在“第四号”《新民说》一文旁边，即有这样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直等到我能背诵。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我很感激我的老表。（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不欢喜“假洋鬼子”，因为他的假辫。但我欢喜听他谈到日本。他教音乐和英文，有一个歌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记得当中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鹰（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地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我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她战胜俄国，我觉得她值得骄傲（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显然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和俄日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春节和全国欢腾的情景——斯诺注）。她很有能力，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日本。

这一切（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得在这个时候，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两年，而我才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实在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的良好的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改革。我因读中国古代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而为之心醉，读了许多关于他们



的书。我在一篇讲到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最初听到美国那文里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⑥的书里，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我起始想到长沙去。那是大城市，湖南的省会，离我的家一百四十里。我听到说这城市是很大的，有许许多多的人，许多的学校，巡抚衙门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很想到那里去，进一个湘乡人办的学校。那年冬季我请高小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他答应了，我于是走到长沙，十分地担心，怕不能进去，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而使我惊异的，我被录取了。但是政局转变得很快，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世界大英雄传》即《世界英雄豪杰传》，是毛泽东从同学萧子暉（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那里借来的。

毛泽东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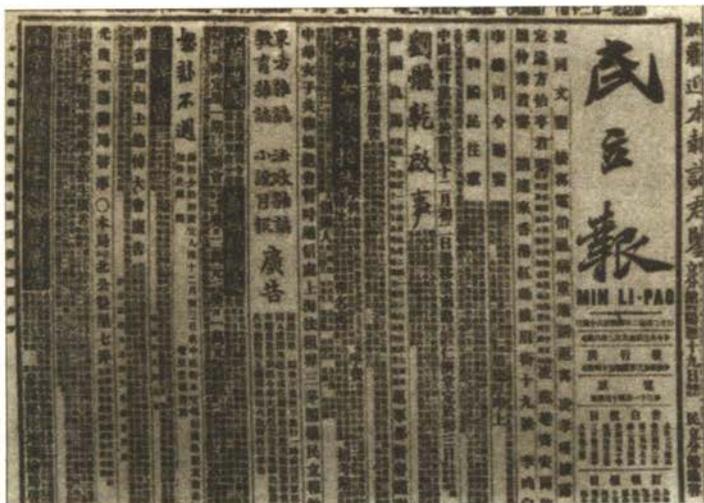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立》^②，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湘人^③领导下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同时看到了《民力》里面充满了刺激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辮的方式来表示他们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辮，

②《民立》报是由中国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和于右任主编的进步性报纸。

③据吴黎平记载，这个“湘人”，即湖南人黄兴。当毛泽东在《民力》报上得知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思想震动很大。他后来在1919年8月4日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本会总记》一文中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阅读的由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



但答应跟着剪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辫，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这法科学生引用经书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可是我和反对蓄辫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汉（昌）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是硝烟滚滚的武昌城一瞥。

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个人都专心一致地听着。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黎元洪的）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向同学募了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大批地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十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冲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到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看守中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②，一般地主和商人不同意他们。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作为地主和军阀的代表，谭延闿^③打倒了他们。[在革命党



● 这一天，即是1911年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领袖焦达峰与原新军排长陈作新率新军攻克长沙，捕杀清廷官吏，成立军政府，焦与陈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

● 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父亲谭钟麟曾做过两广总督。他于1904年中进士，5年后任湖南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湖南起义时，任参议院长。他杀害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后，当上了湖南省的都督。后追随蒋介石，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人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的副本。原件是由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他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他切断指尖，以表示至诚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呼吁召开国会，予断指以送（赴京代表）。”]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学生军已经组成了，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因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来帮助完成革命^③。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一月七元——不过，已经多于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兵士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然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买）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革命的报纸中，有一个《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首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

●毛泽东当时参加的是长沙革命军，即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当了一名列兵。



们。剩下的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和懂得一点经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他们做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果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订）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伟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





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注册，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花了一元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②。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个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③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④。（汤芑铭接替了谭延闿，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

●毛泽东考入湖南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为主题，论述教育在国民素质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提到的这位先生，是国文教师，名叫柳潜，是他借给了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116卷。他读后即产生了自学的念头。他从湖南全省高级中学退学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3里多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很被称道的600多字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柳先生的批语多达150字，称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5年1月，日本以承认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袁世凯表示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遂将一些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为《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即在封面上奋笔明志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问，这就算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⑤。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斯·密勒）所著的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⑥混合起来。



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厕所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

● 舆图，即古之“地舆图”，现在叫“地图”。

● “史地”即历史和地理。



这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校舍，毛泽东曾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半的读书生活。

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做）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自己做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录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枪替”^①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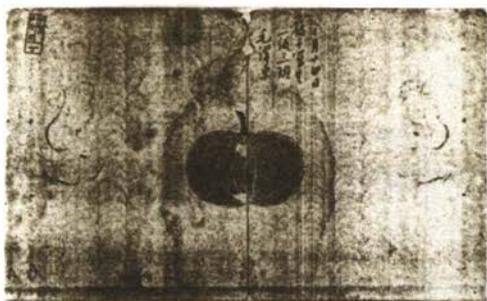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的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是我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别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就是必须的静物描生^②，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山”[是苏东坡的一句名诗]。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圆圈来代表。

● “枪替”即“替人当枪使”之意。古人称“代人捉刀”，现在称“枪手”。

● “静物描生”，即静物写生。





这是毛泽东在校时的美术作业。

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却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说是报人的东西，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

昌济^③。过后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这篇文章一百分^④。

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大香炉”^⑤，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我没有钱，想我还是先游历湖南吧！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学生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



③ 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因心系中华而改名“怀中”。六年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矢志教书育人。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毛泽东很喜欢上杨先生的课，经常去他的家里请教、探讨问题。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1914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杨先生还担任了指导老师。毛泽东对杨先生非常崇拜，1915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

④ 杨昌济最欣赏的两个学生是毛泽东和蔡和森。1915年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看来，杨昌济一直将毛泽东视为“异材”。

⑤ “大香炉”为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的俗称，有时也特指大昭寺等著名佛寺。另译作“打箭炉”。

什么地方，总是受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一个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未进而成（为）友谊。

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这个团体^④后来对于中国的命运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这种国家危急之秋，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我对于女人并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

●“上海版”注：这个团体即后来建立的新民学会。

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④。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普通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⑤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⑦的事。

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间、山坡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⑧。在已经结霜的天气里，我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⑨。凡此种种，



● 据说毛泽东对父亲的最大“不孝”，就是这次抗婚。父亲为他娶的这个媳妇姓罗，实际上并未成为事实。只是在《毛氏族谱》中可以找到这位原配妻子“毛罗氏”。

● “买肉”，南方方言，即嫖妓。这里的“肉”，是指妇女出卖肉体。

● 用人，即佣人、仆人。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此句一向是中国古代男子汉、大丈夫的训条。

● 所谓“浴风”，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23日日日记里记载得很清楚了：“今日早起，同蔡（和森）、毛（泽东）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

● 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当时，他不仅经常约好友同“游”，还在学校组织过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经常晚饭后畅游湘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校注自己的《沁园春·雪》之中，曾有这样一段批语：“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同学合影。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都算是体格锻炼。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后来我是何等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时候。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我开始了解一个有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在一九一六年，我和几个友人成立了新民学会^④，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一九三五年）；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暉（萧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音），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会员的大部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



④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于1918年4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革命组织，主要成员有何叔衡、张昆弟、李维汉、陈昌、罗学瓚、向警予、蔡畅、陈亮和夏曦等。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⑤。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在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创始人中还有邓颖超女士等。——斯诺注),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⑥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做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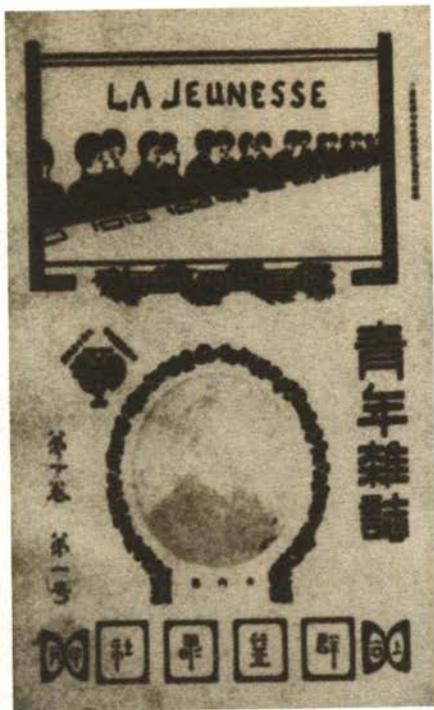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

●互助社成立于1917年10月8日。原文曾提到林彪曾是社员,吴黎平认为不正确。

●毛泽东在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与同学加强体育锻炼的一篇心得,题目叫《体育之研究》,7000余字。当时,他用的笔名为“二十八画生”,意思是,在繁体字中,“毛泽东”三个字的笔画是28画,现在他又做学生。据说,他的这篇文章是老师杨昌济推荐给陈独秀的。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是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毛泽东是该杂志的热心读者。

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我于一九一三年入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⑤。

⑤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的妙高峰下，湘江岸边，东临粤汉铁路，与岳麓山隔江相望。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瓚、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和萧子暉等，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

[斯诺引言]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他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他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当我向其他红色领导人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致勃勃地聆听这些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往往不了解彼此在入党以前的情况，那些日子往往被看做一种黑暗时代，人们的真正的生命只是在入党以后才开始。

在另一个晚上，毛盘膝而坐，背靠在两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头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继续讲下去。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③。这样，更切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在去国^④以前，这般青年预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的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

●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在他15岁那年，母亲就病了，时常在外婆家养病。1918年夏，他自长沙去北京前，还特寄给舅舅一个药方，为母亲治病。1919年春，他还将母亲接到长沙就医。这年秋天的10月5日，母亲终因患瘰疬（俗称“痂子颈”）而去世，年仅52岁。毛泽东在回家奔丧期间，还写下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母文》。后来，他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不损人的，损己利人的。他认为母亲属第三种。母亲去世后仅三个月，毛泽东的父亲也于1920年1月23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是年50岁。

●“去国”即“离开国家”，这里指出国。



在长沙时期的毛泽东

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助理员，薪俸每月八块大洋^⑤。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到）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高级的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谭平山和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

⑤毛泽东之所以没有立即报考北京大学，主要是当时的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即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所以，他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管理着15种中外报纸。

尼亚的“三K党”。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激进）。至于为什么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⑥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不穷的欣赏。（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平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



● 来到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一起。所以，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称当时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可见同学一处，求学艰难。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借了十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⑦。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的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还有过这些游历:我曾沿着洞庭湖作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 这里说的是山东邹县 这里的孟府、孟庙和孟林,被称做“三孟”。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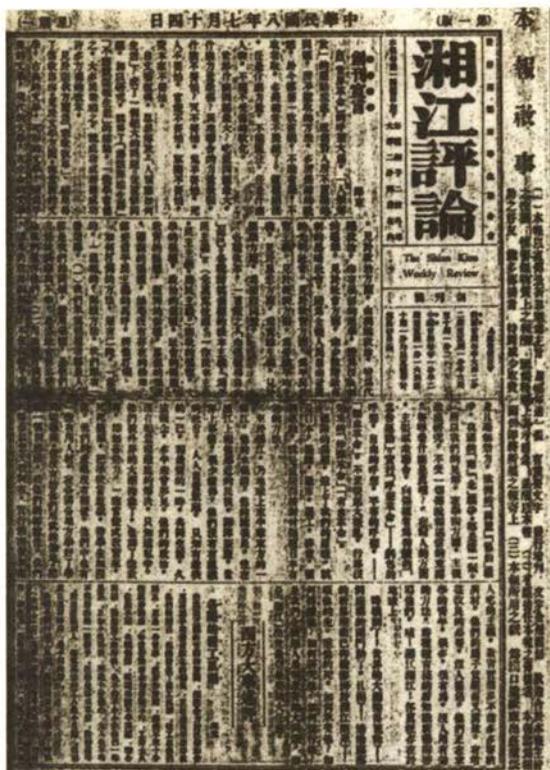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大混蛋张敬尧^⑤。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来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

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平，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杨开慧，毛泽东夫人。1901年11月6
日生，毛泽东老师杨昌济的女儿。

一九二〇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〇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⑤。

● 杨开慧生于1901年11月6日。她自小随母亲住在长沙板仓。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1918年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1920年2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她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在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他们是花了6块银元置办的结婚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她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自传



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斯诺引言]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通过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来,安排同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不久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一群中国学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如果我们没有忘掉在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小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而且也是除了俄国以外,惟一能够以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而自豪的共产党。

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⑩。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

⑩毛泽东是1921年6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据谢觉哉回忆,6月29日下午6时,毛泽东与何叔衡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船赴沪。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大会，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书籍，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⑥。是年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在其他省县中也有组织成立，[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杀）、李达、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一九二九年被杀害）。山东省委

⑥ 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国内外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12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青岛）、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参加。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会址设于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即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1921年7月23日开始开会，最后一天（31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组建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委会成员合影



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同时，在法国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几乎同时成立，[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较迟。党员中有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还有高语罕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党员有周佛海）。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及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的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学

生和工人之间，在农民中的工作极少。多数大矿山和实际上全部学生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许多斗争。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赵省长下令处决两个工人，结果引起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第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他。在工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相当势力，当时各工厂大部分组织到“全湘劳工组合”里面。可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并且用协议的方法阻止了他们许多次鲁莽无用的举动^②。

我被派到上海来组织反赵运动。是冬[一九二二年]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我回转湖南，并竭力推动工会的工作。是春，发生许多次罢工。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待遇和争取工会的承认，多数罢工都是胜利的。五月一日湖南发动一次总罢工，这件事指出了中国劳工运动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召开的，通

② 1922年1月16日，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受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杀害。毛泽东提到的右翼劳工领袖就是黄爱。当时，毛泽东曾安排李立三去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去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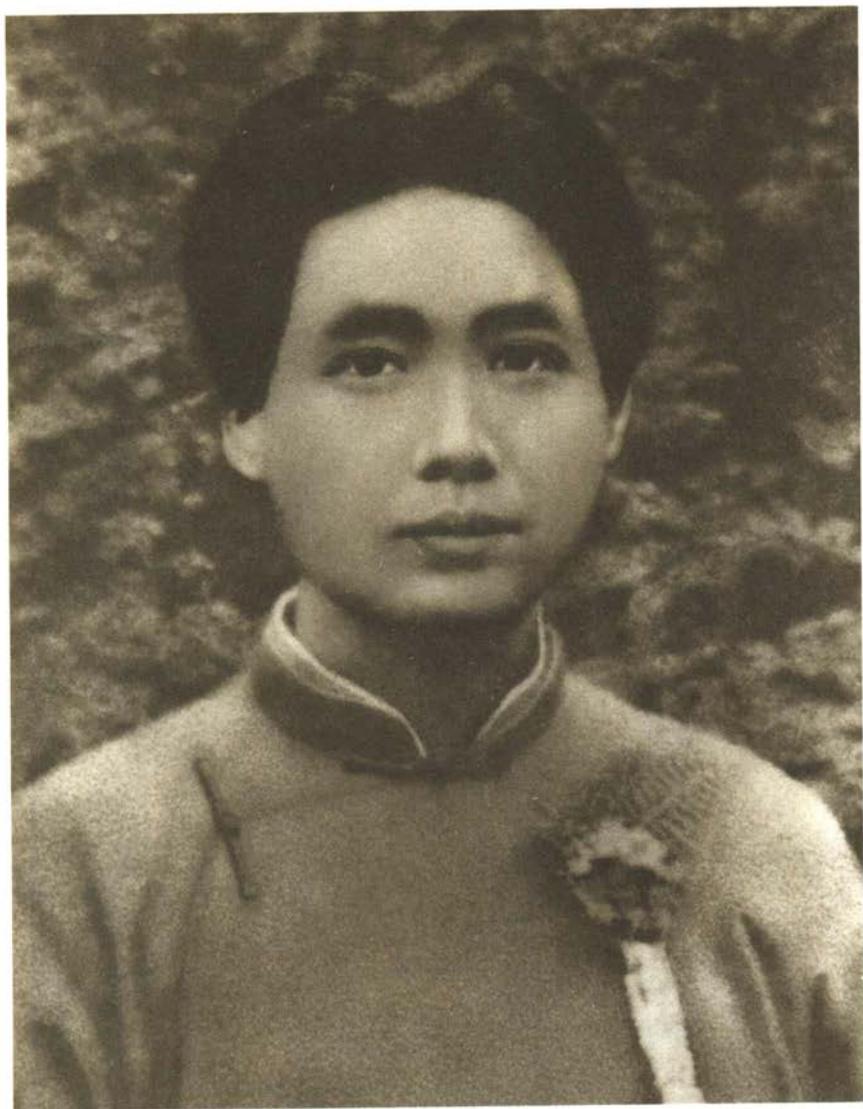


过了那历史的决议案：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并组织联合战线以反对北方（洋）军阀。我跑到上海去，并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③。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广州去，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三月间，回沪，将我在共产党执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来。当时部中还有的几个人，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调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步骤。是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现在（叫）伐西里·布留契尔将军，任苏维埃远东红军总司令之职〕担任顾问，还有其他从苏联来的苏维埃顾问。国共的合作的开始采取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是年冬，我回湖南休养。在上海时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后，我组成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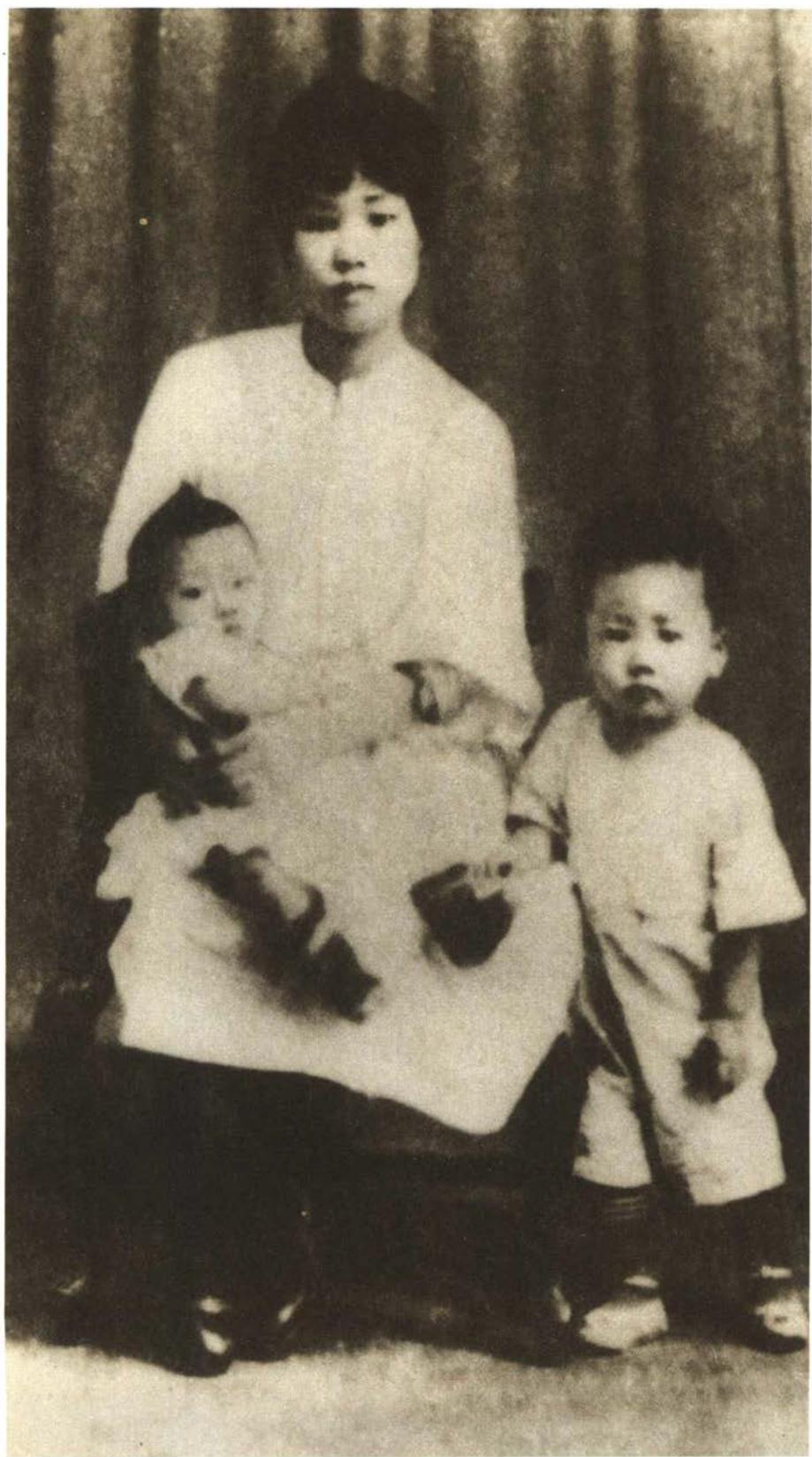
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跃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中，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同时引起了

● 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由李维汉接替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22号，离开杨开慧和刚满6个月儿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此时，赵恒惕已在长沙街头贴出布告，悬赏缉拿毛泽东。

●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借这次机会，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于1925年2月6日与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回到了韶山冲。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到广州。到达广州时，黄埔学生刚打倒了两个著名的军阀^⑥，全城和国民党充满了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先生被任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刊物，后来曾极力攻击国民党右翼。我同时又成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负责人，并开了一个课程来训练他们。听讲的有二十一个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我成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组织部长。）

我写作越来越多了，同时在共产党农民工作中负有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在组织湖南农民的工作中所得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任务》。在第一个小册（子）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陈独秀反对我这意见，并拒绝

● 据吴黎平记载，这两个军阀即滇系的杨希闵和桂系的刘震寰。

杨开慧与幼年时的毛岸英、毛岸青合影。杨开慧1920年冬同毛泽东结婚后，跟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她遵照党的指示，留在长沙地区坚持斗争。1930年10月，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入狱，11月14日在长沙壮烈牺牲。

沁园春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万仞苍崖，
 忆往昔峥嵘岁月。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25年8月，毛泽东重游橘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词，抒发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



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为止。一九二六年春，在国民党左右翼和解而国共两党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开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的农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开始这历史的北伐。

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国土地经



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不过，在大会过后，一个全中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共产党的态度对它很冷淡。高级官吏和军事长官开始要求镇压它，说农民协会是“流氓协会”^⑥，它的行动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件事，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反共的运动，在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暴动（许克祥反革命叛乱），有几十个农人和工人被杀。此后不久国共就分裂了。

许多共产党领袖现在都奉命离开武汉，到苏联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去，我请求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员会的书记。但十天之后，陈命我速回（武汉），责备我组织一个反对当时统治湖南的人的运动。党里的事务现在是一塌糊涂了。几乎每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国共合作的解体不久也使他没落。

⑥ 亦被称为“痞子会”，当时的农民运动又被某些人诬称为“痞子运动”

【斯诺引言】 毛泽东有一次同我谈话的内容是关于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的、引起人们很多争论的那些事件。我觉得在这里是值得提的，这不是他同我谈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把这次谈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明显地意味着灾难临头的时刻，使党丧失果断的领导和它自己的独立路线”。

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赞成激进的重行分配土地的政策，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



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武装暴动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将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也不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从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溃；其后不久它自己也被蒋介石摧毁了。

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而是干脆下命令。显然，中国党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当然，武汉的惨败成了苏联国内围绕世界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的中心。也就是紧接着这个时期，苏联国内的反对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批倒，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垒的地位。

可是毛认为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更大胆的政策，



八七会议会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并且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反革命也不会在一九二七年被打败，“但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使那里的苏维埃以后再也不会被消灭掉……”

毛在他的自述里，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于还要赤手空拳地从失败中斗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与朱德合作，领导了历史的南昌暴动^⑥，并组成了后来变成红军的第一个部队。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局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决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久长的公开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一个运动，就是后来叫做“秋收暴动”^⑦的。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五点：共产党党部完全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农工革命党，没收大中小地主的财产；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党政权；组

⑥即南昌起义。

⑦即秋收起义。毛泽东曾为这次起义写下了一首词，叫做《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织苏维埃。当时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才进展成为一个口号。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农民协会，我已经组成一个普遍的暴动，并成立农工军第一队。我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农民本身（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汉（安）源的矿工和国民党中叛变的军队（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这个早期的革命的军队，叫做“第一农工军第一师”^⑨，是经过省委会的批准后组织起来的。但是湖南委员会的和我部队的总纲领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好像只采取一种观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实的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



⑨ 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要再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线敌委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⑩。随后不久他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的军队，作了许多次战斗，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分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余洒度）逃走后，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陈浩）。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老诚（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例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



● 这个“武汉军校的学生”名叫余洒度。

冈山 [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强盗盘踞] 时，他们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了。湖南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标运动”^①。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冈山上，一面确切地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从一九二七年秋，第一师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建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已选举出来^②。在这个苏维埃及以后几年中，我们依据了迟缓但是有规律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纲领，伴随着一个温和的政策。这使井冈山备受党中央“盲动主义者”谴责，他们要实施一个恐怖政策，劫掠和杀戮地主并焚烧他们的财产，以摧毁他们的胆量。第一师的前敌党委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动者戴上了“改良主义者”

● 这里的“标”，即“标枪”、“梭标”的简称。“劫标运动”也就是“枪杆子运动”。

● 据《西行漫记》载，这届苏维埃政府主席名叫杜修经。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

的帽子。我备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不实行一个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踞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在井冈山开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人^③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力量合并起来了。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我们稳定和加强湘赣粤三省接境区域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地发展到更广大的区域中。这种策略竟与党中央的办法相反，他们有着迅速的扩展妄想。在军队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与两种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以为是“冒险主义”；第二，要想退到广东省境之南，这我们以为是“退却主义”。当时我们的见解，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权和建立苏维埃政体。我们要武装群众，以加速这种过程。我们的政策（是）要实现自由贸易和善遇被俘的敌军，一句话，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会议代表（代表会议）在井冈



●这两个人就是袁文才和王佐，两人是拜把兄弟。当时在井冈山的这两支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60枝枪。“王部”踞山上茨坪和大小五井，“袁部”驻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1928年2月中旬，袁、王部正式被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



红军帮助群众收割庄稼的场面。

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表示出来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信仰这个政策。当决议提出来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到达井冈山时才得（以）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



动领袖间的“争点”^④完全取消，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着重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面，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⑤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部（队）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但因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与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络（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当我们在井冈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争山的企图。井冈山证明了是我们建立的这一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支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

● 即“争论的焦点”。

● “广州暴动”即广州起义。据《西行漫记》载：江西的运动是由方志敏和邵式平领导的，海陆丰的运动是由彭湃领导的。

早色森
巖石壘
更加累
成城
黃洋界
界上炮
初陽陸
敵送敵
軍宵
通
西江月

毛泽东 1928 年秋所作的《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热情讴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一个山]⑩。

[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暴动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萍（长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黄公略（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牺牲）和滕代远等人也都在第五军。]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冈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四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总（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铜鼓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⑩ 据《西行漫记》记载，“大小五镇”就是大小五井。“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

毛泽东自传

肆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还有另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就是“流氓性”^⑦——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变。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样（的）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⑧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的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运动的力量。同时，进行了一个对托派的猛烈斗争，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在党中和军队中的官职。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红军陷入艰难的地

●当时红军中的“流氓性”，即指一种“流寇主义”思想。

●此会议为“古田会议”。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举行。



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址。1929年12月在这里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指导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边就失势了。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沦入红军手中。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军政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成立苏维埃。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瑞金。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斯诺引言]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

随着他的叙述的将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追问他自己

毛泽东

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什么？我的追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个叙述的最后一章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⑦，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

服从命令；

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

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

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个条件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

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

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

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

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

和农民以诚相待；

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

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



● 这里指红军的纪律更加严明。

所^⑧。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纪律^⑨，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基本宗旨的：

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

第二，武装群众；

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一九三〇年春，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的率领下转到共产党营垒来的，他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骨干中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任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第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司令员是

●毛泽东在井冈山最早宣布的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又根据一些实际情况，总结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即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我军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即“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朱德，我是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书记。那时第一军团已经有一万多人，编成十个师。除了这支主力，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队。)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还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四个字一条的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②，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普通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



● 此被毛泽东、朱德总结为“游击战十六字诀”。毛泽东解释说，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后来，此“十六字诀”又被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的“速战”。

在一般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非常不平衡地前进，即以“跳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有的土地。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的、集体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主义的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⑧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和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行军中，他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

●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就是李立三主义的出台。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决议以“城市中心论”为基点，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项以武汉为中心的全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红军元气大伤。

李立三

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于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人）。我在湘潭的土地 [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暴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④以及我两个兄弟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拘捕起来，我的妻和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⑤。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天天增高了，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



●这里的“妹”，指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

●1928年11月7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湘赣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并集中了6个旅约3万兵力，于1929年元旦分5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妹妹，还有其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杀害。



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倒。假若砍倒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来，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⑧。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陷落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第一次占领后而且作为暂时的举动，不想守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它的影响可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对长沙之役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斯诺引言】 我要暂时打断一下毛的叙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常来往于上海和汉口——共产党在那里设有“地下”总部，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后才把中央委员会转到苏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他支配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他被解除政治局的职务，并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李立三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大城市采取有力的进攻策略。他要在农村搞“恐怖”，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要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要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后方陷于瘫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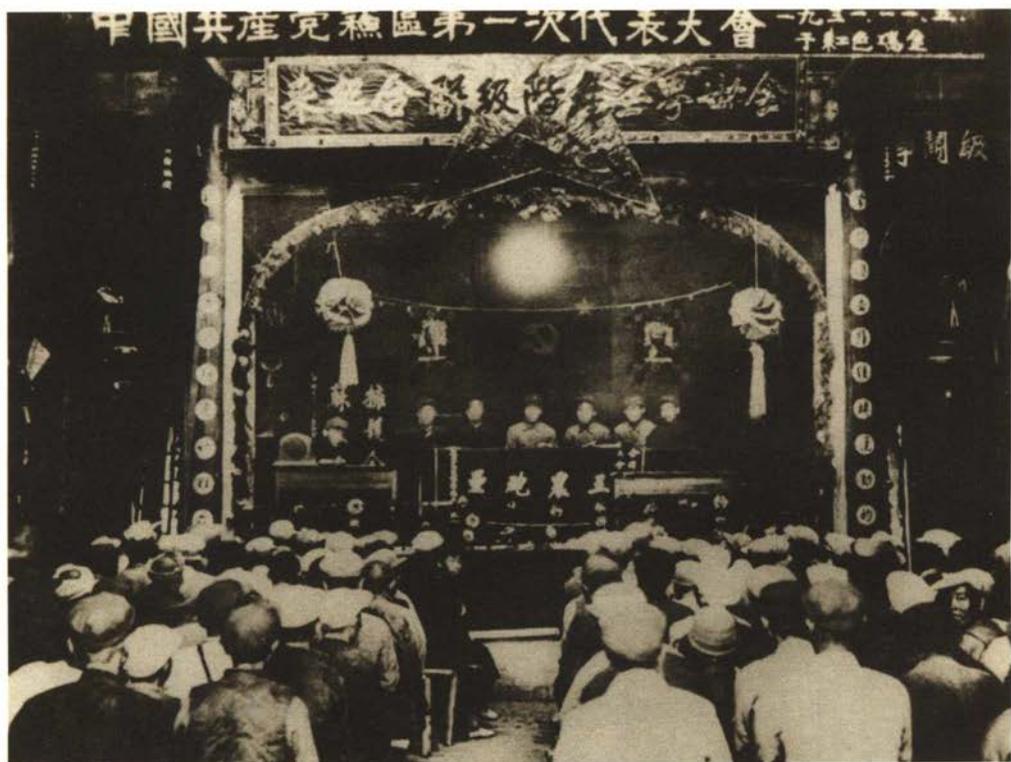
毛接着谈下去。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他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⑦一停止；而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



●此“内战”是指1930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磨擦不断，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100万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



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便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还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政治的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⑧。富田靠近吉安——当时苏维埃区的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的战斗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的忠诚和农民的支助，这次叛变也就很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政府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〇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敌军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四万人来对抗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克服了第一次“围剿”，获得了绝大胜利。依据“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

⑧富田事变的哗变者为第二十军的刘铁超。



各个击破。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的人数对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我们可以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间，第二（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的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和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队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区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敌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仍就抱定了前次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第二路），打败好几个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毁。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六）次，行军八日，以决定胜利的结束。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

三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做“赤区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每天只八十里的行军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毛泽东（站立者）在会议上讲话。



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蒋的战术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前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冗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⑧。四月，宁都暴动^⑨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现在，红军开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势，进击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

● 另，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 宁都暴动即宁都起义。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17000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李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艰险的一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师（国民党第十一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捷战证明了决定的特点，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高级指挥职务。）

到了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人，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到了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厉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地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做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成）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



1933年6月26日，中央苏区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右一为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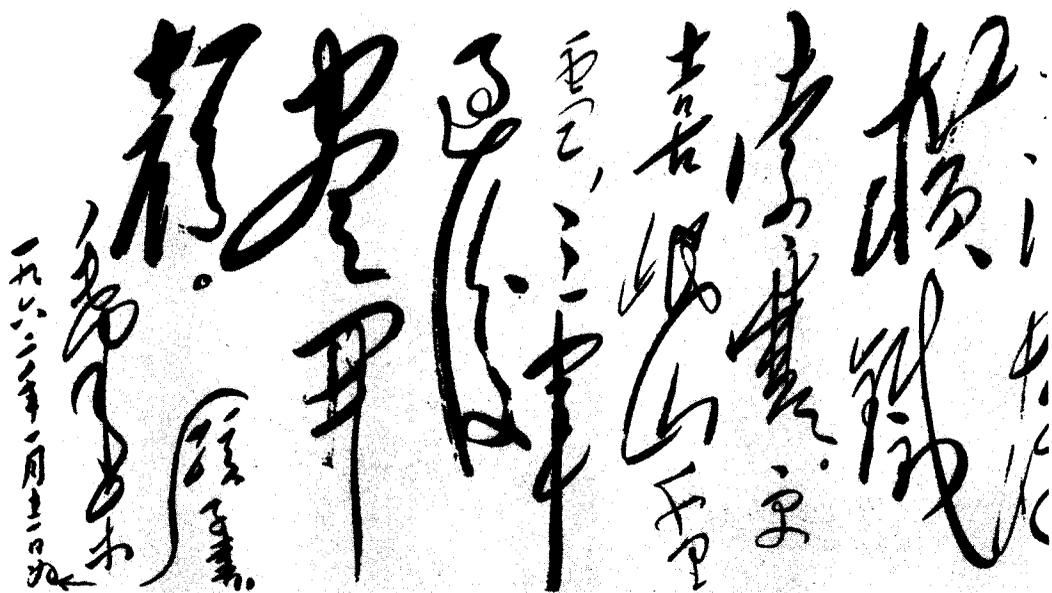
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企图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到西北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阵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作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所有的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做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全体人员，如今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黄河（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且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后面追着全部国军的



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一
九
三
五
年
二
月
二
日
书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七律·长征》。这首诗作于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之际。

卜長征
孤軍一旅
征難兼水
子山只葉閒
五嶽遙遙
月浪高
石
石
浪拍青山
大渡如

一半，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和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的伟大的西北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地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组织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于马—伊主义^①，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组织中的人才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许多多的优秀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在一个宗旨下工作，同时也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那些未来的，将要达到它的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召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共同工作。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的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方向做去。

① 马—伊主义即马列主义。这里的“伊”，指“伊里奇”，也是列宁的名字。列宁名字的全称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长征途中，毛泽东正在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形势。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毛泽东自传

附

录

斯诺传略

《毛泽东自传》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生于1905年的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开了一家不大的印刷厂，家里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从小，他的父亲就要他“子承父业”，也从印刷业开始自己的生涯。但是性格坚毅的斯诺，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20世纪享誉世界的著名记者。

多少年后，斯诺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父亲相信，让我哥哥和我在星期六和假日里做工，可使我们懂得‘挣钱就得劳动’。我9岁就开始帮人把包件从斯诺印刷公司送到《堪萨斯市星报》报馆去，报馆那幢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的中心是一间宽大的生气蓬勃的记者工作室，在那里，我从远处深深地敬慕那些编辑们。”童年时代的这些见闻，在斯诺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种子。数年之后，他毅然从美国中西部的出生地远涉重洋，在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中，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

还在童年的暑假期间，不满10岁的斯诺就在凯蒂铁路公司当上了一名勤杂员。公司发给他的到奥扎克斯去旅行的周末通行证，使他开始对旅行发生了兴趣。这段生活，促使他在14岁时同两名同学一起到更远的原野上去游荡。

斯诺回忆说：搭乘鲍勃的新型旅行车进行一次探险，这件事在上路以前我一直瞒着自己的父母。大部分旅程是沿着当



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时尚未铺砌起来的圣菲小道行进的，这条小道一直向远处伸展，消失在沙滩和泥砾之中。鲍勃在圣莫尼卡同他的父母一起走了，查理和我因为把随身所带的钱花光了，只得流浪回家。不过，要不是在那年夏天我亲眼看到了太平洋，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如此坚定地下决心要航海跨越这个大洋。

斯诺感叹道：要不是像流浪汉那样搭乘货车游荡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边，穿越过费瑟河峡谷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我还不会那么早就品尝到艰苦探险的乐趣，不会那么早就知道大自然和人生竟是如此丰富多彩，也不会那么早就知道对于刚刚发现自己的体力（如果不是意志）已能在世界上胜任大人们干





的事的一个青少年竟会得到陌路相逢的人的好心关照。

那年秋天，他回到学校之后，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发现了某些外国人物，使他想起那次夏季探险中遇到并产生好感的一些工人和失业者（体面人物心中的“流浪汉”）。斯诺说：“是雨果为我打开了一个思想意识和各种重大道德政治问题的陌生的新世界，并且把我卷进了一个遥远而又轰轰烈烈的历史时代中去。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理解，读书可以代替旅行，是仅次于实践的人生第二最佳乐趣。我的早期游荡生涯及其影响，对于我的生活方式来说，可能比我所受的全部正规教育起到的作用还要大。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人生如风中之烛’。”斯诺就是这样既燃烧自己，又珍惜生命。

斯诺的“生活方式”是全球性的。他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他也认识贫富之间、权势者和卑贱者之间的一些关系。大学毕业后，他曾计划“周游世界一年”，但后来竟发展成为使他终生开展各种活动和建立各种关系，使他在这个多事的（但往往被他看作是美好的）行星上度过的65年中，既处于洪流之中，又身处于波折之外。中国和中国革命，对斯诺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928年他到达这个“天朝之国”之后，他一留就是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间，他迷恋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传统。他为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种种划时代的问题所吸引。当他认清了这场革命，并看到革命已经起来，即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寻常、最具有深远意义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时。作为一个人和一名记者，他听到了召唤。

1928年，斯诺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第一次来到中国。7月初他到达上海，先协助鲍威尔编辑《密勒氏评论报》。当年底，鲍威尔专程陪他到南京会见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孙科。孙科派交通部一个姓吴的官员陪同斯诺，用半年多的时间沿铁路线旅行采访。在南京，斯诺游览了明城墙和中山陵。正是这次旅行，使斯诺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有了确切的了解，亲身体会了腐败与堕落，看到了许多地区的贫困与落后，

看到了灾荒与饿殍。斯诺后来说，这次旅行是他关注中国命运的“觉醒点”。

1933年春，新婚不久的斯诺携妻子海伦到达北平，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写稿谋生，后任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纽约《太阳报》特约记者。1933至1938年间，斯诺又担任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尽管他采访并写过许多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与国家——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伊朗、阿拉伯国家、非洲、欧洲、墨西哥和苏联，但他却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直到1941年，斯诺才离开生活了13年的中国，返回美国。

1949年，斯诺同妻子海伦·福斯特因性格不合，导致的裂隙越来越深，最后不得不离婚。同年，斯诺与百老汇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洛伊斯·惠勒结婚，两人生有一儿一女。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回中国访问，持续时间均较长。在中美关系长期紧张，两国互相敌视，几乎没有美国人能进入中国的那一段非常时期，斯诺能数次访华，确实是格外引人注目的礼遇，显然这是由于他与中共领导人在保安时期建立的特殊关系与友谊。这与《西行漫记》向世界介绍红军，宣传陕北根据地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斯诺也遭受很大的压力。1951年，中国政府领导人就曾邀请斯诺旧地重游，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显然无法成行。直到1959年，斯诺携家小移居瑞士日内瓦湖畔，他重访中国的愿望才于次年得以实现，但也只是孤身前往，妻儿未能同行。

斯诺也是一位著名摄影家。1930年，斯诺在登临泰山时，就拍摄了不少风光照片。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有许多他自己拍摄的照片。当时他是秘密进入苏区，没法多带胶卷，所以要一张一张地计算着拍。这些照片是红军根据地首次接受外国人拍摄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地以外的人能看到这些照片是很不容易的，今天看来也还是十分珍贵的。除了自己拍摄外，斯诺还获得允许，翻拍了经过长征残存下来的一些珍贵的资料照



片。这些照片记录了红军被迫从中国东南部的江西苏区（1928年—1935年）撤退到陕西新根据地之前的一些人物和事件。《西行漫记》因此集中收录了一大批延安根据地中共领导人的图片，以及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的照片，还有士兵、平民和儿童的一些留影。这些人在斯诺和不知名的摄影师的镜头前神态各异，有英武挺拔的，有坚定自信的，还有活泼可爱的、拘谨局促的。虽然当时和后来陕北根据地的吴印咸等摄影师拍摄了一大批珍贵照片，但由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无疑更具有特殊历史意义。

斯诺一生共写了11部著作，大多是长篇纪实和新闻报道类的。内容多数是根据采访而来，有些是辗转的传闻。除《西行漫记》外，还有《远东前线》、《活跃的中国》、《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这边》、《红色中国随记》、《旅行于方生之地》和《漫长的革命》等著作。斯诺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去世，两天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斯诺病重时，中国派出以马海德为首的6人医疗小组，专程飞赴日内瓦为他治疗。斯诺在临逝世前，曾收到了白宫邀请他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访问的信，他拒绝了。临终时，他还不忘中国。他说：“我热爱中国。”并留下遗嘱，要求把自己的一半骨灰安放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斯诺去世后，夫人路易斯·惠勒·斯诺把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个小花园中，这个小花园一度是燕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斯诺以他的笔粉碎了“赤匪神话”，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尊重。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斯诺为中国所做出的一切，他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中美）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毛泽东在唁电中称：“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斯诺第一次与毛泽东相见^①

我在这里^②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10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



●本文系《西行漫记》里《苏维埃掌权人物》一篇，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此指陕西保安县。

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质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做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因为，否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



1939年10月，毛泽东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之称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做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



1936年东征时期的毛泽东

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1937年）44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900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1934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300万；鄂皖豫苏区200万；湘赣鄂苏区100万；赣湘苏区100万；浙闽苏区100万；湘鄂苏区100万；总共900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10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8000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





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还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



在延安窑洞里写作的毛泽东

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28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或者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





在延安，毛泽东正在阅读斯大林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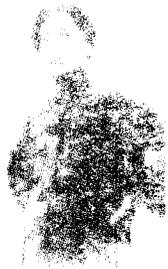
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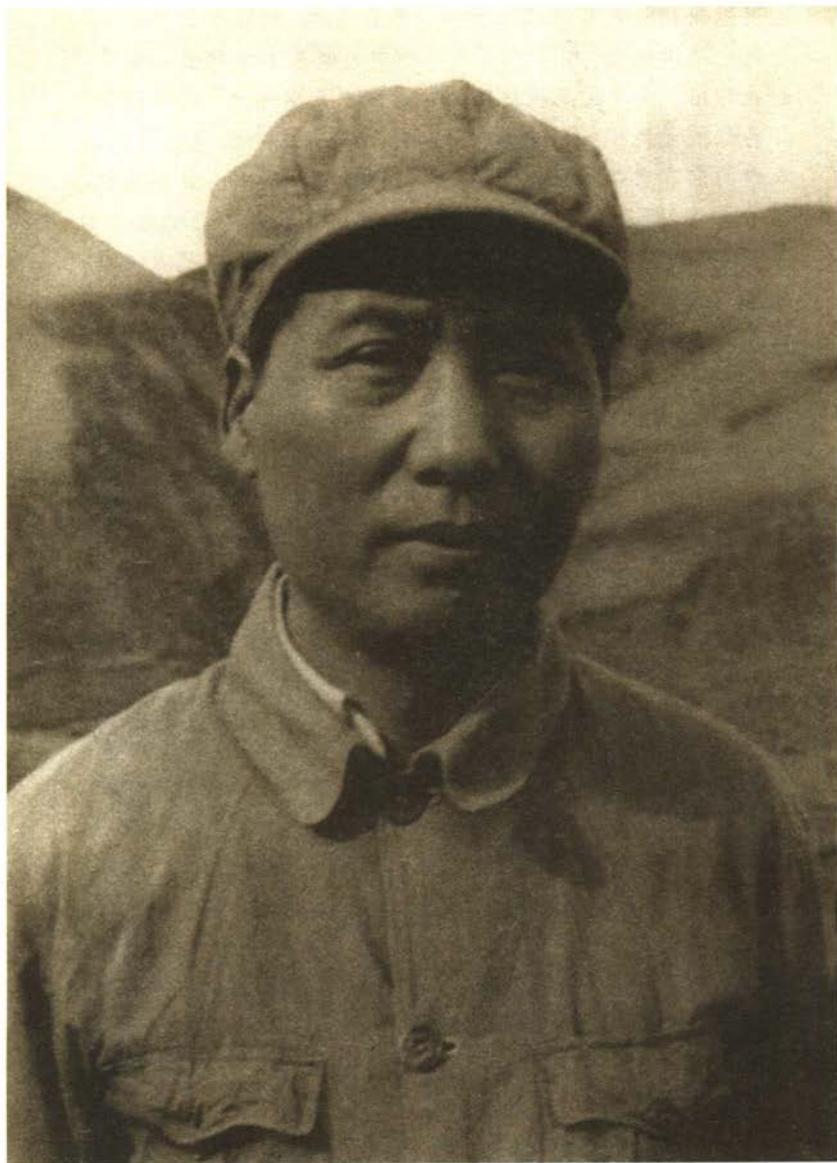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③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6000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④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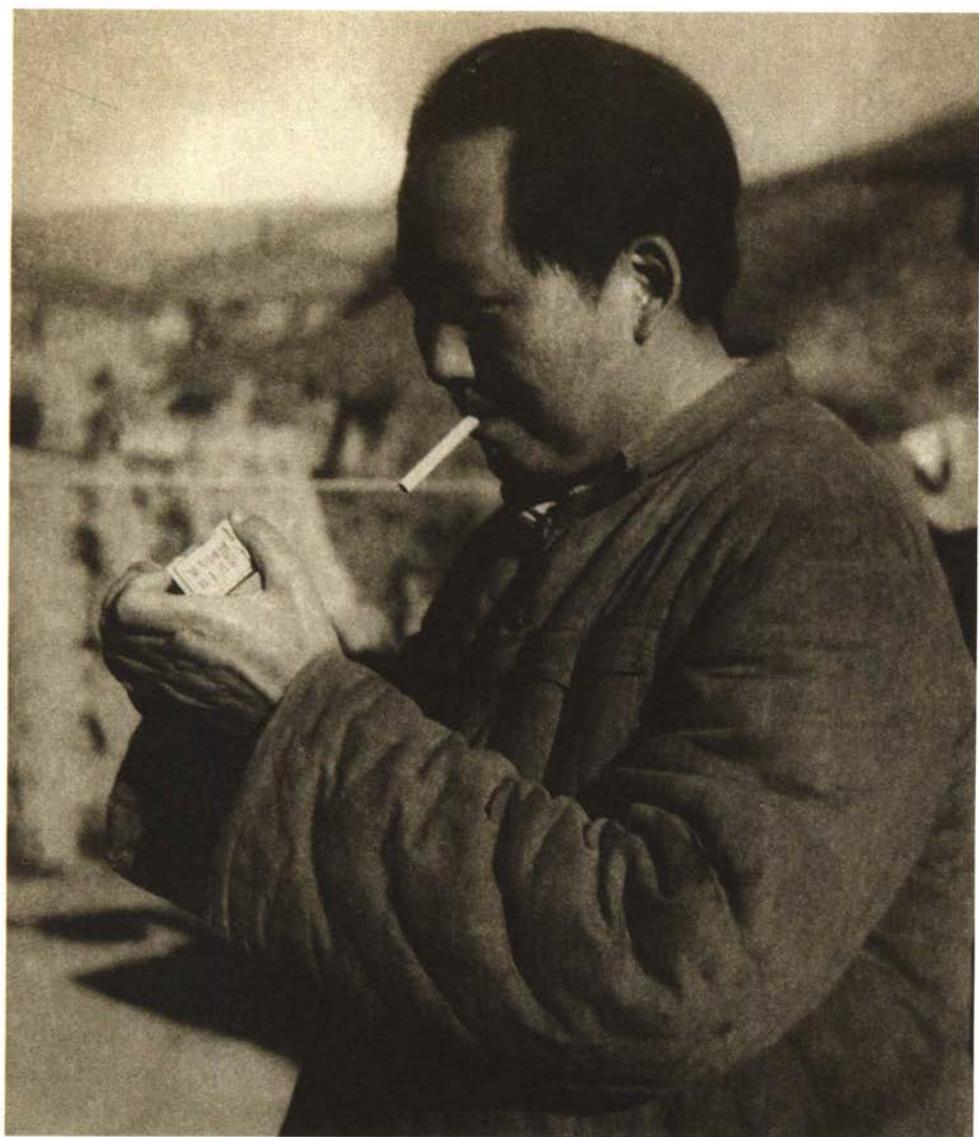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 一译博洽德(1848-1923),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著有《通俗资本论》

● “银”,即“银两”。“银弹”的意思是“利用金钱进行收买”。



决战前夕的毛泽东

《毛泽东自传》的问世与版本之研究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在这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在青岛又相继发现了《毛泽东自传》1947年和1949年两个不同的版本，意义非常重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时期，就曾以口述的形式，接受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留下了这部光彩照人、朴实生动的“自传”。而《毛泽东自传》（青岛版）的发现，从目前全国已发现的一些版本来看，无疑是早期中国革命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本文将从《毛泽东自传》产生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和众多版本之比较等方面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

一、斯诺为何要采访毛泽东

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斯诺自己在《西行漫记》里的陈述。他说：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脑子里总是在想，在“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中国”中，“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



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28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发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是斯诺百思不得其解的。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和谜底,惟一的办法,就是必须亲自到红色根据地去走一趟。斯诺解释说,可是这种办法“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入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也就是1936年6月,当斯诺的一位中国朋友给他带回了个使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消息的时候,他真的意识到了“天赐良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消息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已经在陕北“剿共前线”处于停火状态,斯诺以其极强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立即做出了准确而及时的判断:

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

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斯诺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精神、牺牲精神和对于事实真相勇于探求的精神，勇敢地向“红色中国”的所在地——陕北出发了。不过，在刚刚出发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出现过一些在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可是不得不反复思考的问题：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还有，“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公妻’的吗？”

然而，斯诺决意要只身采访“红色中国”，并不是在这次临行前才决定下的。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应美国的《亚细亚》（《ASIA》）杂志之约，打算写一部《毛泽东传》或《毛泽东自传》。按斯诺当时的想法，他认为他应该写的是《毛泽东传》，而恰恰不是《毛泽东自传》。但是《亚细亚》杂志的编辑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执意要的是这个神秘国土上的神秘人物的“自传”，因为这样就会使许多欧美人感到更加真实，从而更能吸引读者。在斯诺为《毛泽东自传》写的一个“代序”中，这一点也就说得更清楚了：

这儿是一个声明。

《毛泽东自传》用的是第一人称，跟这儿发表的完全一样。可是毛氏原先是要求我改用第三人称发表的。如果这样一改，就会失掉了许多正确性和趣味性的价值。

美国一家杂志愿意分期揭载这部自传，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以自传的形式，而不是要用传记的形式发表。其时，我



无法晤见毛氏，也就没法得到他的许可。然而这稿子，如果为了毛氏个人这一点谦逊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觉得牺牲性太大，所以就由我个人负责，保持了原来自传的形式。后来此稿在《亚细亚》杂志上分期连载，曾引起了各方面广泛的注意与讨论。

所以，在斯诺看来，能有机会采访毛泽东，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他千辛万苦地到了陕北保安，一见到毛泽东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几个月后的1936年10月，毛泽东才正式接受了他的采访。

二、斯诺“千里走单骑”

1936年6月，既然斯诺得知了张学良与中共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已秘密停火，他便立即向宋庆龄提出了希望去苏区进行“秘密访问”的请求。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也就是他还在北京燕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已经通过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认识了鲁迅、蔡元培和宋庆龄，并与一些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有所接触，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这些社会活动，已经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感。为了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去，斯诺还曾将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译成英文，成为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所以，斯诺要去寻找“红色中国”的这个请求，很快便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在宋庆龄的秘密联络下，中共中央也随即给予了很好的帮助，并专门派人秘密跟着他，直奔陕北。

于是，斯诺在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教授徐冰的帮助下乘上了西去的列车。临行前，他还收到了徐冰教授转给他的一封信“致毛泽东的介绍信”。这封信据说是柯庆施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用密写墨水写成的。斯诺把它很好地带在身上，一路上当成了他叩响“红色中国”大门的护身符。

为了能够真实记录下“红色中国”的一些珍贵画面，斯诺此行还专门携带了两架德国照相机和24个胶卷。斯诺当时比

较清贫，没有多少钱。他的这些个胶卷，还是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到西安后，他最先见到了杨虎城将军和地方上的国民党行政长官邵力子，从他们的口中，他再一次证实了这个“停战”的事实。

在西安的一家旅馆里，斯诺终于等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董健吾。董当时化装成“王牧师”，是斯诺从国民党控制区到红色苏区的“引路人”。在他与斯诺的谈话当中，斯诺已经意识到此人肯定能够帮助他进入苏区。后来，斯诺在他的帮助下又见到了美国医生马海德，并在红军联络员刘鼎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安排下，乘车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安全进入红色苏区。

幻想真的变成了现实。斯诺成了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对话的美国人，也是第一个以记者身份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外国人。他立即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不受限制的美国客人。

7月13日，在苏区前敌指挥部安塞县白家坪，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斯诺。当时，周恩来还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红色中国”的日程表。三天后，使斯诺备感意外的是，他在苏区中央所在地——保安的一个看似平常的窑洞前，终于见到了衣着俭朴的毛泽东。

三、斯诺与毛泽东长谈

在一篇名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斯诺真实地记录了他最初进入陕北中央苏区所看到的一切。他说：

1936年7月初，我进入陕北苏区，希望能访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且亲眼见识一下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所建立的政权。红色区域目前已拥有陕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兰公路以北甘肃省的事实上全部地区，包括富饶的黄河河谷，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宁夏省的大部分地区。此外，陕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绥远省（旧省名，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

区)南部长城一带以及兰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红军游击队的小部队活动。

目前的苏区是红军迄今占领过的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在红军的历史上,各路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第一次都集结在一个统一的地区里——朱德、彭德怀、肖克、罗炳辉、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贺龙、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全都集中在西北。

我在红色中国呆了4个月。在这期间,我奔波于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主要道路上,又到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在临时首都保安,我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我对中国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指挥官毛泽东的访问总是在夜间进行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延续到深夜一两点钟。毛泽东睡得很晚,而且往往在后半夜从事他的最繁重的工作——这个习惯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谈话非常长,范围也非常广。

毛泽东懂一点英语,这是他在长沙师范学校时学的,但是进行这些谈话时一个名叫吴亮平的留学生为我们当翻译,他是保安的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干部。我的访问记先是全部用英语写出,然后重新译成中文并由毛泽东校正,他以对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很严而著称。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诺一进入陕北中央苏区,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礼遇。在那里,不仅中共的许多高层领导都接见了,而且还将他送到了前线,使他能够有机会及时了解当时的战况。他与毛泽东的长谈是少有的,也是非常传奇色彩的。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间,直至毛泽东逝世,再也没有一位记者能够有机会像斯诺一样,与毛泽东进行如此的彻夜长谈。毛泽东不仅是在向斯诺“介绍”自己,而且是在向世界“介绍”一个政党的成长史和一个正在蓬勃兴起的“红色中国”。

斯诺提到,在他采访毛泽东的时候,中央派了一个年轻的干部给他当翻译,这个人就是吴亮平。吴亮平是浙江人,早年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哲学。红军时期,他是李德的翻译。当

斯诺来到保安的时候，吴亮平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宣传部副部长，后来还做过经济部部长。解放后历任化工部部长、中央党校顾问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吴亮平还是我党的著名理论家和翻译家，早在1930年就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改革开放后，还与艾思奇合著过《唯物史观》。1986年著有《社会主义史》。吴亮平还有一个笔名，叫做“吴黎平”。实际上，自延安的时候起，吴亮平就主要以“吴黎平”的笔名行世。解放后，他一直用的是“吴黎平”这个名字。

据吴黎平后来回忆说，斯诺想为毛泽东立传的想法，是在他一到保安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可是毛泽东没有在短时间内答应他，因为毛泽东或许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必要，或者另有其他考虑。但是经过斯诺的反复说明，也就是在斯诺到来的三个月后，即1936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真的答应了斯诺的请求。但是，毛泽东还是坚持不作“自传”，而是同意由斯诺为其写传，用第三人称来写，而不是用第一人称。他们的采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正式采访是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开始的。毛泽东住的这个窑洞，“非常原始”而简陋。洞内陈设极少，除了应有的一张硬板床外，毛泽东只是在墙壁上挂了一些军用地图。还有一顶蚊帐和一张长桌。后来，当斯诺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相见”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他说：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了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问题的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



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的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大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问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大声说道。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ch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作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

多年后，当吴黎平回忆起当时的采访情景时，也做了如下的描述：

在1936年10月间，毛泽东同志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同志由于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做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

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谈话时斯诺作了详细笔记。

吴黎平还回忆道：“当时在座的还有与斯诺同来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作速记或作记录，毛泽东同志是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的文字。”“关于毛泽东同志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同志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后作了少数修改，交由黄华同志照改后退给斯诺。”

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面容瘦削，高高的个子，一头留得很长很浓密的黑发，双目炯炯有神，是一个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后来将《西行漫记》的书名定为《红星照耀中国》，而书里的“红星”一词，实际上是隐喻了毛泽东本人的。这一点，在斯诺执意要为毛泽东拍一张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和后来的《毛泽东自传》里第一章的标题——“一颗‘红星’的幼年”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就是“红色中国”上空的一颗熠熠闪光的“红星”，他不仅代表他自己，而且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即将崛起的“红色中国”。所以斯诺后来还有这样精辟的阐述：“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四、《毛泽东自传》是如何出版的

现在已知，《毛泽东自传》中文译本的最早出现，是在1937年8月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出版的《文摘》杂志上。据现在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新闻史研究家秦绍德教授考证，当时的《文摘》杂志基本上是美国《亚细亚》（《ASIA》）英文杂志的一种中译本。也就是说，前一期在《亚细亚》杂志上刊载的文章，后一期的《文摘》杂志上就会立即有相应的翻译文章。其实，这也是当时中国创办“文摘”类刊物的一种惯

例。因此，当斯诺在1937年7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分4期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时候，上海的《文摘》杂志即于8月份也开始分期连载了它的中文译本。现在已无法确定斯诺在“笔录”《毛泽东自传》之前是否知道上海就有这样一家能够直接翻译美国《亚细亚》杂志的《文摘》杂志，但是根据他与上海的密切关系，他是应该知道的。这也就是斯诺要应《亚细亚》杂志之约而专程采访毛泽东的缘故了。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文摘》杂志是在第二卷第二期开始连载《毛泽东自传》的，当时该杂志已改名为《文摘战时旬刊》。据秦教授称，《毛泽东自传》是在该杂志的“人物种种”栏目中开始连载的。

而《毛泽东自传》最早的中文译者汪衡，当时不但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而且还是《文摘》杂志的编辑之一。汪衡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版权研究家。他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1935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又转入经济系。1937年7月，当他看到斯诺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毛泽东自传》时，便立即着手翻译。此外，他还根据斯诺在《亚细亚》杂志上的另一篇文章，译出一本名叫《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册子。这两个译本，当时均由上海的黎明书局出版发行。因为他翻译的是红色书籍，所以不久就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最后，他不得不秘密离沪去鄂，做了必要的“逃亡”。

汪衡因博学多识，通晓多种语言，新中国成立后还被同行誉为中国翻译界和出版界的“百科全书”。自1979年起，他曾长期致力于我国版权的创建和制定工作，为中国最终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汪衡曾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1993年1月去世。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1937年11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单行本，书的封面还有潘汉年题签。这也是汪衡在《文摘》杂志中译本的一个结集，成为《文摘小丛书》之一。当

时汪衡只有20多岁，还是一个正在读书的大学生。同常人一样，他对于“红色中国”的许多情况知之不多，再加上译校时间比较仓促，所以1937年的“上海版”差错率是较高的。但是，不管怎样，汪衡最先面世的译本，无疑是当时翻译界的一声春雷。他使数万万国民能够有机会了解到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了解毛泽东这样一位影响20世纪中国革命伟大进程的领袖人物。汪衡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一定是很欣慰的。因为他的译本仅“上海版”的一种版本，就发行了70多万册，而且一版再版，其深受读者喜爱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另一位名叫“吴光”的译者，是在汪衡接手翻译《毛泽东自传》之前就先译了一章，这就是1937年8月发表在《文摘》杂志上的首期《毛泽东自传》的连载。但是“吴光”这个名字只是在这时闪现了一下，后来再也没有出现，也没有在版权方面和单行本的署名方面引起纠纷。所以，我们今天是否可以有这样的推测：一、“吴光”很可能就是汪衡一开始使用的一个笔名。二、当汪衡接到英文原版时，一开始“吴光”曾经与汪衡一起译出了第一章。三、“吴光”是否是中共地下党一开始参与汪衡译著的一个笔名，因为后来的单行本很显然得到了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的大力支持。四、汪衡一开始之所以使用“吴光”这个笔名，是否也有躲避国民党图书出版审查的意思；后来发现杂志出版一切顺利，便开始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五、“吴光”或许另有其人，一开始是暂替汪衡捉刀。综上所述，不管怎么说，“吴光”都是一个值得让人记取和研究的名字。



五、关于《毛泽东自传》的版本

据所查阅的资料和湖南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闵群芳、文平志、肖喜雨及知名学者倪墨炎的研究成果统计，近年来《毛泽东自传》的许多版本已被相继发现。许多版本都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和《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能够查到。现按其

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 《毛泽东自传》，史诺笔录，汪衡译，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文摘战时旬刊》连载，1937年8月出版发行。

2. 《毛泽东自传》，史诺笔录，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于1937年9月出版发行。附录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毛泽东论抗日及联合战线》、《毛泽东论抗战必胜》、《毛泽东等呈蒋介石一致对日抗战电文》4篇文章。

3. 《毛泽东自传》，史诺笔录，汪衡译，文摘社1937年11月1日初版，11月20日再版，黎明书局经售。文摘小丛书之一。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4. 《毛泽东自传》，斯诺著，张宗汉译，延安文明书局印行，1937年出版。

5. 《毛泽东自传》，史诺著，张洛甫（张闻天）译，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出版。

6. 《毛泽东自传》，斯诺记录，平凡译，上海战时文化书局1937年出版。

7. 《毛泽东自传》，斯诺记录，翰青、黄峰合译，上海新生图书公司出版。1938年1月出版第3版。

8. 《毛泽东自传》，斯诺著，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8年出版发行。附《毛泽东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论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论抗战必胜》、《毛泽东等呈蒋委员长一致对日抗战电文》。卷首有华尔煦、韦尔裘尔威格、华特的前记。

9. 《毛泽东自传》，斯诺记录，丁洛译，上海三友图书公司1946年2月出版。

10. 《毛泽东自传》，史诺笔录，汪衡译，胶东新华书店1947年7月出版发行，印数1万册。附《中国共产党年表》。

11. 《毛泽东自传》，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印行，1948年3月出版，5月香港再版。附《中国共产党年表》。

12. 《毛泽东自传》，斯诺笔录，汪衡译，冀中新华书店1948

年出版发行。附《中国共产党年表》。

13. 《毛泽东自传》，国强出版社印行。

14. 《毛泽东自传》，天明译，文孚出版社1949年5月30日出版。

15. 《毛泽东自传》，史诺笔录，汪衡译，1949年7月1日至2日，由《胶东日报》连载了第一章。

16. 《毛泽东自传》，合力出版社印行。

17. 《毛泽东自传》，中南出版社翻译，1950年12月中南出版社初版。在卷首“编者的话”中称，该书作于“椰嘉达”（即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很明显，在这17种《毛泽东自传》版本中，以汪衡译本印数最多、影响也最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汪衡不但率先最早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自传》，这就是1937年黎明书局的版本，我们可称之为“上海版”，而且10年之后的1947年，他又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修订。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汪衡的版本在1947年的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在社会上多有发行，而且还是中共的红色书店所出版发行的，并成了中共党内的学习材料，这无疑具备了某种权威性。而在青岛地区发现的这个版本，正是这样一种可供党内和军内学习的版本，因此说汪衡的“青岛版”也就更具亮点，更为国内研究界、收藏界所珍视。

当然，汪衡另几种类似的这种版本还有许多，也是中共红色书店所出版发行的。如当时的东北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和华东新华书店等等都曾出版发行过类似的传记，但因书名都用了《毛泽东传》，而不能列入我们今天所说的“自传”范围。当时还有《毛泽东印象记》、《毛泽东先生访问记》、《毛泽东同志传略》、《毛泽东的故事》等等，也不算少。所以说，《毛泽东自传》“青岛版”是《毛泽东自传》出版史中的一个分水岭。它的出现，还可以看做是这部“自传”大规模出版的第二个高峰（第一个高峰以1937年和1938年为标志）。随着200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印“上海版”《毛泽东自传》和今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重版的“青岛版”《毛泽东自传》，当是《毛



泽东自传》在新时期迎来了第二个出版高峰。

六、“青岛版”与“上海版”之比较

通过以上的版本比较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就汪衡所译《毛泽东自传》的版本而言，“上海版（黎明书局）”和“青岛版（胶东新华书店）”不仅代表着两个出版时代，而且在版本上已经有了许多改进。由于“上海版”的出版时间比较仓促，加之汪衡还是一个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青年学生，知识和阅历都不算太深。另外，汪衡自觉和不自觉会受到当时时代的一些限制和影响，如白话文刚刚产生不久等等，所以初译时其中的许多语言都比较艰涩难懂，有的还不够通顺，这大概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结果。

可是，1947年的“青岛版”就不同了。由于当时是作为中共胶东区党委下发的干部政治读物，由我党的胶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所以译者汪衡即在原“上海版”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重译和改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部2.8万字的“自传”中，汪衡的改动就达千余处，并且删除了数百字，增补了数百字。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岛版”不是“上海版”的改写和润色，而是对照斯诺英文版的一种重译和重新校订。因此，“青岛版”不仅比“上海版”更准确、更生动，也更有文采。许多书中原来历史事实及典故的错译地方，这次都被改正了过来，这正是“青岛版”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

至于“青岛版”是否是经过了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的审定，现在还难有定论。但是，就它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所印的几十万册来说，没有有关中央领导的审定和认可是不可思议的。另外，直到1949年7月，为了纪念党的生日和新中国的建立，“青岛版”《毛泽东自传》还在当时的中共胶东区党委机关报《胶东日报》上连载了部分章节，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青岛版”的准确性和普及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汪衡的译本不仅在全国发行量最大，而且翻译水平也最高，这

是时代所造就的。

从“自传体”译稿版本学的意义上讲，版本不同，其所涵盖的内容、“讲述者”说话的语境和心情也就会有所差别。《毛泽东自传》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版本，其主要原因是斯诺在记录毛泽东经历的时候，语言比较简约。这本来是一件非常令人庆幸的事情，但无形之中也给众多译者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谈话，除去风趣、幽默和诙谐之外，还有机智、深邃和用典多等特点。因此，这部“自传”的难译也就可想而知了。“青岛版”之所以在许多方面成为一种“善本”，这与汪衡后来知识的积累、文字水平的提高也是分不开的，这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研究伟人毛泽东不啻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史料。

现在我们将“青岛版”与“上海版”做一下具体的对比，看看下面的一些例子，读者对于这两个版本的特点会更加清楚了。

如，在“上海版”中，毛泽东曾将父亲经营的家业称作是“达到‘富’农的状态”，而“青岛版”即将“状态”改正为“地位”。这虽是一个平常词汇的改动，阅读起来就大不一样了。再如，“上海版”中称“他（指毛泽东的父亲）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而在“青岛版”中“儿子们”即被改成了“儿子和妻子”，这样一改，当然就更加准确了；因为毛泽东的父亲当时经常骂他，所以“上海版”称“我愤恨他”，而“青岛版”却改为“我咒骂他”。还有，“上海版”称毛泽东说他的父亲，“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而“青岛版”则改为“屈膝一下”。这种改动看似减轻了原来描写的程度，但却更加接近毛泽东当时说话的语境。另有，“上海版”称“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而“青岛版”则把“苛刻”改为“死硬派”，以此来描述父亲的思想保守和顽固。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喜欢引用古书，《盛世危言》就是一例。这是郑观应热心西学，鼓吹洋务，主张改变国家政体而撰



写的一本进步书籍，而“上海版”却将其错写成了《醒世良言》。当时，老师是反对毛泽东读这一类书籍的，因此毛泽东称“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上海版”载）等等，而“青岛版”便将“告诫”改成了“酷诫”，一字之差，意蕴是不一样的。

还有，在“上海版”中，有这样一段话，即“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而在“青岛版”中这段话被改成“九岁的时候，我便板起面孔讨论我的父亲对母亲的欠缺礼貌”。另有，“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改为“我的父亲在宗教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还有，毛泽东在写到他的父亲突遇老虎这件事时，“上海版”称“后来他对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使人读来感到生硬、摸不着头绪，而“青岛版”却写得明明白白：“后来他回想老虎神秘逃去，感觉很奇怪。”

还有，“上海版”中的一些错误，如果我们不对照一下“青岛版”是完全看不出来的，或者只会给读者造成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如“上海版”中有“抢替”一词，使人读来有些别扭，说的是毛泽东由于学识渊博，被请去替同学们考学，结果一考就中。“青岛版”却把这个词改正为“枪替”，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现在的“枪手”。结合上下文一看，“枪替”果然正确。毛泽东说：“我那时并不以为‘枪替’是一件不好的事。”毛泽东在谈到他与李立三初识的时候说：“李听完我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且进而成为友谊”（“上海版”载）。此话恰恰说反了，而“青岛版”中就做了这样的改动：“我们的相识并未进而成为友谊。”再如：“湖南的省委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初看这句话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但一翻“青岛版”，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劫标运动”。因为中共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是在党做出“武装暴动”这个重大决定的基础上发起的。这里的“标”，最初含义就是“梭标”或“标枪”，而在这个时候指的就是“枪”，就是号召千千万万民众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所以也叫“枪杆子运动”。

“劫标”，就是夺取枪杆子的意思。还有像“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当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击破”之误。当然，像把“敌军”写成“国军”，把“长时间”写成“长时期”等等的例子也不算少。

总之，汪衡重译的“青岛版”，确实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也更接近于斯诺的英文原稿，同时也就更能体现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自我描述。

在1938年春，毛泽东曾亲自对一位德国记者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中美）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而“青岛版”的发现，不仅是我们青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贡献给世人的一份最好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半个多世纪后对于已故的著名美国记者斯诺、翻译家汪衡的最好的纪念。



后 记

一部《毛泽东自传》就是半部中国革命史，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横断面。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历史巨人、时代巨人，而且也是一个很讲求实际、敢说真话，既有坚定性，又有灵活性，更有策略性的人。他说到做到，刻苦好学，手不释卷，毕生奋斗。就是少年毛泽东，也是一个很有情趣、很讲感情、很富于幻想的人。以上这些，就是我编注、校订这部《毛泽东自传》时的最直接和最真切的一种感受。

18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胶东日报》上连载的《毛泽东自传》的时候，我简直有些惊呆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少年毛泽东。从那几张破旧发黄的报纸上，我知道，毛泽东也挨过父亲的打。他的家世，算不上富裕，仅仅可以算得上是吃穿不愁。但是他有痛苦，有彷徨，有走错路、做错事的时候，也有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时候。从那以后，我一直关注着关于他的一些传记。直至今日，当我终于找到了这本曾经在胶东地区发行的《毛泽东自传》的“青岛版”时，我便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因为在中共青岛党史上，也确实需要增添这闪光的一笔。这就是我之所以要编注、校订这部领袖传记的起因。

还有一些事情也是促成这部《毛泽东自传》“青岛版”出台的重要原因。一位是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青岛晚报》总编辑余钦伟先生，是他与我的默默约定，才使我有勇气对于这件事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走访、考证和调查，所以我首先要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理解。接下来，还要衷心感谢青岛出版





社的社长孟鸣飞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看了我在《青岛晚报》上发表的一则关于该书的调查访问记后，就立即确定了这本书的选题的。为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及时出版这本书，他曾亲自与我研究确定编注、校订的方向。他还曾为此事专程到访北京和济南，向国家有关部门报请审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独具慧眼、善于决断所带来的。不然，要在两三个月内出版这本书，应该说是一件很难想像的事情。如果说此书的编校水平能够获得广大读者认可的话，这与他的鼎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编注、校订前人的著作，本身就是一件既繁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编校别人已有多种版本的旧译稿，其工作量也是难以想像的。这是我在做完了这项工作时才有的一点不得不说出来的体会。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次我们终于查到了汪衡的“身世”，可以免去许多人的种种猜测。而对于给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的吴黎平同志，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介绍。这就使得这部《毛泽东自传》“青岛版”有了更真实、更详尽有力的史料支持。

《毛泽东自传》的其他版本，将来很有可能还会有所发现。但是，作为一座城市来说，既拥有单行本，又有报刊连载，恐怕在全国，也只有上海和青岛有此殊荣。只是今天，我们青岛又增加了一种“编校本”，这无疑又是一件很令人庆幸的事情。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重修订出版的“青岛版”《毛泽东自传》中，我们还首次刊发了一篇斯诺的“代序”，此序是从“文革”时期油印的《毛主席的回忆》里找到的，可谓非常珍贵。

我从事青岛地方历史的专门研究已经23年了。20多年来，不管是在史志办，还是在报社，我的工作一直被认为是“职业史官”。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忘不了自己的“职业属性”，由此也使我结交了一大批“老青岛人”。此次贡献《毛泽东自传》版本的徐家骥老人，就是我的老相识。另一位潘在时老人又成了我的新朋友。在这里，我要为他们的对我的工作的支持表达我最

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还要再次感谢青岛出版社同仁对我的厚爱和对本书所付出的诚挚的努力。至于我在本书编校方面的诸多谬误和不足之处，亦请读者不吝赐教。

王 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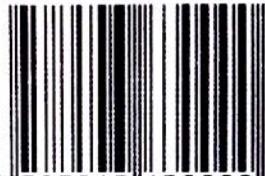
2003年9月15日于青岛含风阁



彩色影印《毛泽东自传》原本

毛泽东

ISBN 7-5436-3000-1



9 787543 630000 >

定价：28.00元